

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

——再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肖贵清

【摘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诞生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提出了如何衔接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时代主题的转换提出了“先锋队”角色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回答。在当务之急层面,阐述了“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各项具体任务;在长远目标层面,提出了中国革命阶段转变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报告》在百年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完整而清晰的建国方略,为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和中国革命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使党永葆革命性和先进性的政治要求,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关键词】毛泽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研究”(23ZDA005)。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于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是实现中国革命的主题和任务转变的枢纽。作为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毛泽东所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一篇关于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纲领性文献。

一、中国革命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面临的形势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站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即将踏上崭新的历史征程,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难题。

(一)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正如列宁所言:“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9]}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民主的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不变的革命目标。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2][563]}。到了1949年春,由于解放战争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务之急。在没有现成答案、缺乏成熟经验的情况下,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推动革命形势不失时机地向前发展,迫切需要党对战略策略进行总体擘画,为各条战线制定一系列新的工作方针和具体政策。

在政治上,亟须规划关于新中国政权组织形式和政党制度的方针政策。由于战争形势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筹划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的任务大大提前了,原本的建国计划也需要调整。由于尚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商议决定直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3]1375},并提出1949年将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3]1379}联合政府。在国体确定、政体设计提前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如何体现统一战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对这些问题需要作出明确回答,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在经济上,亟须恢复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4]146-147}已遭受数十年战乱的中国大地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更要进一步带领全国人民开展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走向繁荣富强。这对于长期扎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无疑复杂且生疏。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5]926}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取决于党能否制定全局性的、周密的纲领和政策,统筹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经济生产工作,学会管理工厂、农村、银行、铁路等方面的工作。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提出了如何衔接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革命制定路线和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革命发展的阶段性

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先领导人民完成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1937年,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作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6]276}。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7]1060}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科学理论。实行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政策和方针,正是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中国革命这篇文章的“上篇”马上完成,而“下篇”也旋即开启。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问题的主要表现,已经从革命的阶段性问题变化为革命的转变问题。相比于政权建构、经济恢复等当务之急,革命转变问题的影响更为长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初步提出革命后首先建立一个“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2]672},利用“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7]1058}来发展生产。但是中国革命具体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这种转变采取怎样的方式和步骤进行?用多长时间来完成转变?这些决定新中国发展方略和基本国策的重大问题因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充满未知,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和回答。

(三)时代主题的变化提出了“先锋队”角色转换的问题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自身也面临着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到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一角色转变。全党能否胜任新角色,适应新的时代主题和新的革命任务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在新征程上成败的关键。

一是技术层面,主要任务的变化要求全党掌握建设新社会的能力和本领。随着战争的胜利和经济建设的展开,党的主要任务即将从军事战线转移到

经济战线,从组织农村根据地的战时生产管理转向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运行。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13]1480}从1948年起,毛泽东多次提出要重视知识分子干部,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职员吸收加入革命队伍^{[8]540}。

二是思想作风层面,斗争条件的变化要求全党保持革命本色。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广大党员干部即将从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走上各项事业的领导岗位,不仅工作和生活的物质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也将掌握更大的权力。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党员干部很容易遭受官僚主义的侵袭,丧失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精神和作风。中国共产党能否经受住新形势的考验,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一问题令毛泽东尤为担忧。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提醒全党避免“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14]227}。为避免此类现象发生,全党必须发扬其在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层面的优良传统,并以新的精神面貌适应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

总之,历史的转折向党提出了制定并实施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大任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宽广的历史视野、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清醒的理论自觉。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总能带领全党准确把握形势的变化、及时抓住关键性问题,提出富有远见的正确主张,开辟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新境界。毛泽东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报告正是这一特点的生动体现。

二、《报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

纵观毛泽东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正是通过阐述建立新政权的基本主张,对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重大问题作出针对性的解答。

(一)回答了“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各项具体任务的问题

一是总揽全局,抓住新中国建设的重点工作。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和千头万绪的各项任务,毛泽

东采用了“抓重点”的分析方法,条分缕析地说明了各项工作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在总体战略中,党的工作重心要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这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历史性转变。全党必须围绕这一转变掌握新的工作方法,“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13]1428},同时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城市各项工作的关系中,要着重解决经济的恢复和建设问题。“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3]1428}而在城市生产的恢复发展工作中,毛泽东规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13]1428}通过统筹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之间的关系,新中国各项工作和事业的推进便有了条理和章法。

二是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在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必须重视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新政权的阶级属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基本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但也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13]1437},才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争取更多力量,实现国家富强。因此,在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问题上,全党必须统一思想,并落实在工作中、通过新政权的制度建构来保障这种合作成为长期政策:“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来。”^{[13]1437}

三是在经济建设上,总任务是要独立自主地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仅靠政治上取得独立是不够的,归根结底要通过“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3]1433}。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半殖民地的中国在1949年仍然极度贫穷落后,“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3]1430}。因此,在国民经济恢复后,逐步实现经济独立、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和赶上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需要集中力量来实现的第一要务。

(二)回答了中国革命“怎么走”的阶段转变问题

中国革命发展阶段和革命转变的理论问题是党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政策转变的基本依据,关系到“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3]1429}。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这一涉及理论和原则性的重要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并在《报告》中从综合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作出了全局性判断。

第一,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主要矛盾的分析作为判断革命阶段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国,一方面具备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3]1430},这些工业经济大部分被集中地掌握在帝国主义者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另有少量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绝大部分由落后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构成,“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3]1430}。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呈现出复杂形态,总体性的落后生产方式和局部性的先进生产力并存。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指出,全国解放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社会将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社会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3]1433}

第二,勾画了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基于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力的先进性和生产关系上的反动性,“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

民经济的领导成分”^{[3]1431},将最先进的生产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成为经济发展和革命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对于落后的农业经济而言代表先进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层面也带有一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革命性,因而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3]1431}。同时采取节制资本的政策,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适当的限制;对于分散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既要承认其长期存在的事实,又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3]1432},通过组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信用和消费合作社,发展初级形式的集体经济。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1433}。由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和经济政策内在地规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因而各种经济成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明晰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途径。

第三,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后“两个转变”的理论命题。在综合分析当前中国社会性质、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阶段转变的理论主张。这一革命阶段的转变是社会形态的总体转变:在生产方式层面,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完成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生产关系层面,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3]1432}。根据毛泽东的设想,两个转变在现阶段应该有所侧重,前一个转变是后一个转变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当前的主要方向。毛泽东指出,为数不多但分布集中的现代大工业催生了足以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而这些大工业如今掌握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手中,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物质、阶级和组织基础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前途,“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

会主义的错误”^{[3]1431}。但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还十分落后,因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能很快发生,“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3]1431}还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3]1432}。

(三)回答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清醒认识到,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形式:“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9]432}为此,党必须付出比战争年代更大的努力来进行自我革命。在《报告》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

一是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从“战斗队”转变为“工作队”。随着中国革命的主题从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管理城市、组织生产的任务日益增加,迫切需要一支有知识、懂技术、讲政治的党员干部队伍。为此,毛泽东向解放军提出了从“战斗队”变为“工作队”的要求:“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3]1426},军队要为党培养选拔能胜任地方工作的干部。这一要求同样是面向全党发出的:新的革命阶段中,全党要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习工业、农业、交通、财经等方面的生产和管理技术,掌握现代经济的运行规律,从一个擅长作战、土改的党转变为一个能够管理城市、管理经济的党。能否胜任这一任务,对于新中国的存亡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3]1428}同时,毛泽东坚信,“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1439}

二是在思想作风建设方面,践行和发扬“两个务必”。在毛泽东看来,要使全党能够经受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风险挑战和严峻考验,归根结底在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全党在革命胜利和伟大成就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永葆革命初心。因此,毛泽东在《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要求和基本遵循。毛泽东冷静而忧虑地意识到全党在胜利面前存在居功自傲、固步自封,甚至腐化堕落的危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3]1438}清醒认识到这“四种情绪”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在新的革命征程中必须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并发出了“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1438-1439}。

三、《报告》在百年党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价值

与《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相比,学界对《报告》这一文本本身的研究不多。但作为在历史转折时刻完整地论述了中国革命任务转变、革命阶段转变、党的角色转变等诸多重大问题的文献,《报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价值和影响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推进理论创新、加强自身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提出了完整清晰的建国方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革命阶段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引

将《报告》放在中国共产党建国方略发展的思想链条中考察,《报告》是一篇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报告》是毛泽东对党的建国方式、新中国的基本制度、中国革命的阶段转变等重大时代课题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后的理论成果,也是全党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智慧结晶,在党的大政方针擘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方面,《报告》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新

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基本蓝图的擘画。从短期来看,《报告》与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1949年1月政治局会议对建国问题的集中思考相衔接;从长期来看,《报告》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多年来酝酿的建国方略的凝练和充实。从中共六大的经济纲领,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联合政府》中的民主联合政府,再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三大经济纲领,《报告》与这些著作中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地加以具体化。作为短期规划和长期思考的综合,《报告》系统地规定了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大政方针,确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途径,新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经济方针、外交政策等问题的原则和方向,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格局,对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的精华和集大成者,标志着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基本完成,并和毛泽东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起,构成了日后新中国成立时曾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10][679]}。

另一方面,《报告》为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从根本思想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标志着党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1][27]}《报告》中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成为日后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指导方针。1953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548]}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对于《报告》中“两个转变”原则的明确化和具体化。由此可见,《报告》为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跳出《报告》所着眼的带有时效性、政策性的具

体问题,将《报告》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链条中来考察,《报告》无疑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理论文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典范之作。

一是制定政策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3][430]}。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制定和阐明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之所以能够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提供一幅较为清晰的蓝图,并被历史证明是符合实际的,正是因为建立在仔细分析和深刻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并立足于接管城市的工作实践中产生的经验。这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是通过调查研究实现认识的飞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报告》的形成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以其中关于经济成分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内容为例:1948年9月,张闻天通过对东北经济制度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初步探讨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作为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并作了精心修改,如强调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制定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整套的经济组织来指导国民经济建设^{[11][23]},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调整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13][281]}等,明确和深化了党中央对于经济政策的原则和方向问题的认识。最终,这些思想和认识汇聚和综合在《报告》中,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方针。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人的调查研究,到《报告》的最终形成和发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十月怀胎”式的量变,到“一朝分娩”式的质变,是一个认识上的

不断深化和突破过程。

三是完整勾勒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辩证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由城市到农村,再回到城市,这是中国的辩证法^{[8]539}。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注重把握中国社会状况的特殊性,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教条,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随着中国革命的主题从战争转向建设、中国革命的特点从特殊性向一般性复归,毛泽东在《报告》中展望全国未来时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3]1427},与时俱进地重新将革命和建设的重点转回城市。至此,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经历了从城市转为农村、再从农村回到城市的转化过程。

(三)提出了使党永葆革命性和先进性的政治要求,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将《报告》放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思想链条中来考察,《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阶段。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时谈道:“两个务必”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14]25}。《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务必”作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对于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塑造的价值难以估量。

《报告》诞生七十多年来,在“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精神的鞭策和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担当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时刻牢记和践行“两个务必”,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纠正干部作风问题,严厉惩治腐败,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和宗旨,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进一步取得明显成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带

领全国人民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两个务必”进一步升华,向全党提出“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之“三个务必”的号召,正是对毛泽东在《报告》中体现出的革命精神与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 [1]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0]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3]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肖贵清(1959—),男,河北灵寿人,法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长沙),2023.5.9~16